

玉渊杂谭

大概稍明白点儿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版丢书大战只不过是一次捆绑了所谓情怀的文化营销。虽然被指不够高明,但主办方也算得偿所愿,在争议声中博得关注,提升了一定的知名度。估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伴随着“噢”一声恍然大悟:原来前一阵那个“4小时逃离北上广”也是他们搞的。

窗外有风

请坚定地“游戏”人生

文·杨富波

职业帆船选手郭川在夏威夷海域失联牵动了很多人。郭川的遭遇,使我想到二十年前的余纯顺,他在穿越罗布泊时遇难,当时也引起过公众关注。

我不是航海或徒步爱好者,可能也有和我一样在想,郭川或余纯顺的意义是什么?

抛开那些高大上的意义,我倒想谈另一种。我想说,郭川树立了一种“游戏人生”的榜样。这个榜样不是用来学习的,而是用来展示的,它告诉我们生命可以有多精彩。

坦率地说,郭川和余纯顺都是“贪玩”的人,甚至把所谓最宝贵的生命也放一边了。玩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玩”是天赋人权。照席勒的看法,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一个自由的人,游戏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游戏,一头连接着爱好,另一头连接着快乐。一个人在爱好的驱动之下投入游戏之中,获得的乐趣可以说是无穷的。比如郭川航海,他不是乘坐豪华游轮周游世界,而是一个人一条船,劈风斩浪,在一般人看来,多么艰难困苦,多么危机四伏,而他却乐此不疲,滋味无穷。

有个词叫“玩物丧志”,其实玩不仅不丧志,而且恰恰是志趣的一种表现方式,从一个人爱玩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志趣、品味。大千世界,可玩的东西真是数不胜数:打扑克、搓麻将、广场舞、街舞、摄影、旅游、潜水、热气球、滑翔机……正因为他的爱好千差万别,才显示出人生姿态丰富多彩。这里面,有些游戏是大众化的,有些则小众。有些人玩大众化的游戏,玩出不一样的花样,玩得出色拔萃;有些人则在小众的游戏中显示出特立独行的人生面貌。

游戏,从本质上说,无高低贵贱之分。当然,不同的“玩意儿”,对玩家的能力要求不一样。航海登山,对玩家的体力、毅力、财力、勇气、冒险和献身精神要求都比较高,能玩会玩的人就少。有时,难免物以稀为贵,我们会觉得这类玩家了不起。不过,说到底,与其说差异在于玩什么,不如说在于玩的态度上。有些人,玩得投入,玩出水平,就令人赞叹。郭川就是这样的玩家,他那种“游戏人生”的执着劲头,令人钦佩。

桂下漫笔

20年前的冬天,曹禺因病逝于北京。曹禺20多岁就扬名立万,但过得并不痛快。曹禺曾对他的传记作者田本相说,写他的传,就要写出他的苦闷心情来。从晚年曹禺还提到过的两个故事,可以窥见他那种复杂的心境。

一个是“王佐断臂”。这个故事在《说岳全传》中有记载。金兀术的义子陆文龙好厉害,岳飞都感到头痛。王佐自断其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妈妈,感动了妈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使陆文龙认清了金兀术。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曹禺说:“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

另一个是孙悟空的故事。曹禺曾说要写一个孙悟空的本子,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幕。孙悟空取经回来,被如来封为圣佛,佛祖问他有何打算、有何要求,孙悟空要求取下头上金箍,让他回归花果山。如来同意了。悟空架起筋斗云乘兴而去,在半天云中看见五座大山,降落下来,撒了一泡尿并写下:“孙悟空到此一游。”此时,天外忽然传来哈哈大笑声:“善哉,善哉!”闭幕!

这两个故事经曹禺之口说出,具有

在巨大差异——这里用“现状”而不用“文化”一词,因为我始终坚持我们是有阅读传统的,并且还阅读的回抱有幻想。可是就目前而言,我们确实沦为一个不尊重阅读的民族,在地铁上丢书,说难听点,和发小广告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那些兴致勃勃想参与丢书的人,和真正保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这两个人群的重合度能有多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不夸张地说,丢书大战的理想

受众实际上是一群精神中产阶级,他们未成中产,先有焦虑,总是在自我感动和精神世界里热泪盈眶。例如现在文娱市场上盛行的怀旧风,其实就是迎合了这一庞大人群的心理需求——唱着青春的挽歌,缅怀一切。今天在地铁里捡到一本书,拍张文艺范儿照片,再配段故作高深的文发朋友圈,酸爽。至于看不看这本书,很重要吗?即使看了这一本,于阅读荒而言还是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而且,那些兴致勃勃想参与丢书的人,和真正保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人,这两个人群的重合度能有多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不夸张地说,丢书大战的理想

既然如此,对于一个逻辑上有硬伤但创意可嘉的营销idea,大可不必太认真。坚持阅读的人,且当此为一乐,看看热闹又不花钱。认可丢书的人,用廉价的自我感动多治愈一次情怀癌,也无伤大雅。

文·杨雪

实不相瞒,我正是那一枚渺小的情怀癌晚期患者。时不时也会发自心底地叫嚣:我该看会儿书了!然后,依然紧握着该死的手机,一晚上又过去了。想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影像空间

李安的刀

文·段善策



美国人不大喜欢这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男主角

《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是李安新片准确的译法。有趣的是,最后官方中文片名定为《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以万达速度、马云奇迹为关键词的时代,“漫长的休息”意味着衰败、堕落和可惜。乃至“漫长的休息”惟有与“假日经济”“拉动内需”这些大词产生关联才能获得其合法性。然而,恩赐的“漫长的休息”也不过预示着,另一场与时间和金钱赛跑的旅程,在所谓的“诗与远方”向你招手。因此,当“漫长的休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奢侈品时,一部关于“漫长的休息”的电影需要通过阉割易装的方式方能登堂入室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障眼法的境界或许比不了《我不是潘金莲》的文字游戏,但对那些冲着片名而去的观众来说,败兴而归几乎不可避免。而对另一些冲着3D/4K/120帧颠覆性书写方式去的观众而言,“见证奇迹”的落空感或许更为强烈。显然,给予影片低评价的人不能接受的,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而是这场事先张扬的画质革命,结果只是为了使长相酷似陈冠希的技术兵比利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更加细腻逼真而已。在很多人眼中,李安选择一部心理戏而不是动作戏开启120帧时代,是一场疯狂而失败的实验,就像故事背景里美军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一样。

伊战以后,好莱坞拍摄了大量描写美军士兵战争后遗症的影片,其中包括获奥斯卡肯定的《拆弹部队》,萨姆·门德斯的《锅盖头》,及易被忽视的《决战以拉谷》《星条旗永不落》等。《比利·林恩》的切入方式显然是第三条路——介于前方战场和后方家园之间。李安把原本主题沉重的故事的舞台放在热闹欢乐的橄榄球赛中,正如他在《喜宴》里的做法,从而产生比简单的道德批判更有力量、更深刻的自省效果。当然,你也可以把《比利·林恩》看作又一部讲述男人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电影。主人公比利的身上太多高伟同的影子——敏感、内向、孤独,不太合群,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愿公开质疑和违背父辈的意志。因此,这个美国故事在本土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与其说是冒犯了美国主流价值观,不如说是主人公过于浓重的东方性格色彩挑战了美国人印象中传统的美国男孩形象,以及典型的美国大兵形象。

然而,正是透过这个隐藏了李安性格的白人小子敏感的神经和深邃的目光,观众才得以在一天之内看到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浮世绘。球队问题明显、战绩糟糕却自命不凡、发战争财的橄榄球队老板正是美国政府的象征。刚为成龙颁发奥斯卡成就奖的克里斯·塔克饰演的搞笑形象则代表了美国文化界的圆滑嘴脸。不欢而散的家庭晚宴、不怀好意的民众则表明战争带给这个以包容自居的国家的社会撕裂。每个人都试图从自己的经历和立场来理解这场战争。喜欢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拉拉队员选择相信媒体,进而相信媒体口中的政府及其推出的国家英雄。亲历社会不公和富人伪善的姐姐拒绝信任由精英操控的国家机器,进而拒绝弟弟充当谎言的炮灰。战争不仅撕裂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共识,而且扭曲了每个人内心的精神世界。

吊诡的是,支撑布蕾姆士士为这场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的战争殉道的信仰竟然来自东方印度教的因果业报。当星条旗伴着煽情的歌声升起,行将再次奔赴前线的刚满19岁的比利泪流满面,不是骄傲,而是悲伤——悲伤自己的初夜成人礼或许终将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梦。在传统的美国文化中,一般把入伍视为男孩成为男人的标志。可以看出,相比父辈对国家荣誉和社会责任的重视,美国青年一代显然更关心个人命运和自我实现。因此,对被媒体封为“Bravo”(勇敢)班的小伙子们来说,远赴异域作战不是为了当英雄,而是出于现实的选择,或者说,是为了逃离祖国的现实。

在中场秀尾声的仰视特写镜头中,这位最新诞生的国家英雄眼睛红肿、神情呆滞地站在巨屏舞台中央接受万人注目礼。这一画面无疑是对《巴顿将军》里乐观自大的美国英雄主义的最大讽刺和颠覆。这便是李安的刀,比杨德昌钝,但同样直抵病灶。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公众微信号

艺苑



梦醒不辨香来处 (国画)

梦真



曹禺与巴金二人相对而坐。曹在给巴金的信中哀叹自己缺乏“生活”。

寓言的意义。为了让陆文龙找回自己,王佐变成了残废。孙悟空历经艰辛,看似回到自由身,但猴性稍一暴露,马上被警告。此时的悟空,金箍不在头上而在心里。一旦做了取经路上的大徒弟,就再也回不到那个自由自在的美猴王了。这些又何尝不是曹禺那被规训多年的心灵企图自我复归的真实写照呢。

很难。他刚讲完,陈白尘补充道,“果戈里到中国来也要苦闷的”。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陷入了沉思。可见,曹禺的苦闷并不是他独有的,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苦闷”。

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曹禺虽然没当上右派,但也是“心弄得不敢跳动了”。他说,在运动中被逼着招供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自己也相信了,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陷入自卑之中,被改造后的曹禺少言寡语、老老实实,为此还受到了“表扬”,理由是曹禺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的熬白菜,装在一个破

旧大缸缸子捣碎,站在门边飞快地吃完就走;吸烟只吸一毛五钱一包的劣质香烟,一吸就咳嗽不止。

心理学塞利格曼曾做过一个著名实验。1967年,他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电击,狗关在笼中,无处可逃,只能忍受苦痛。如此反复多次后,蜂音器一响就打开笼门,奇怪的是,狗不但不再逃反而倒地颤抖。面对逃生的希望,却选择等待痛苦,这被称为“习得性无助”。1975年,塞利格曼证明人也会产生“习得性无助”。但他肯定没想到,就在他用狗做实验的前一年,在大洋彼岸,一场更大规模的“实验”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实验品”之一的,不是狗而是包括曹禺在内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实验”中,曹禺一天到晚心惊肉跳,多次有轻生的念头,甚至跪在地上求妻子“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也就在塞利格曼证明人同样会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后一年,中国的“实验”也结束了。双方的结果是相似的,当“实验”结束,笼门打开,面对那若有若无的自由,知识分子耳边响起的还是那庄严而惨烈的哭声,“善哉!善哉!”

正因为如此,曹禺想把丢失的时间抢回来时,感到那么的有心无力。1981年2月22日,此时的曹禺71岁,离辞世还有15年,他在日记中记下“我立志要从七

文·胡一峰

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日记中,我们看到曹禺“讨论人大常委决议”“赴剧协学习”“到中宣部听……发言”“为崔善善独舞会题词”……做了许多和“放弃社会活动”正好相反的事。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身份的象征,对于行将老去的人而言,显示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又会带来名望和利益。不过,曹禺对此感到十分苦恼,他说“我应作自己的剧作,却屡因这类事,不能如愿”,“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辗转不能休息,也不能静下去,昏昏然。可闭眼休息,想不出东西,就不想”。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他说,可以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也是着急,但偏有些非必要的事情,压在头上,而且推不掉。“使我觉得工作一天,无效率可言,真是浪费”。他甚至哀叹道,“我缺的是真实的生活”。

在那几年里,曹禺曾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从今不再事杂项,拼将残勇赋春风”。然而,作为艺术家,他或许永远无法看透,政治家刮起的春风,并不要他以笔作“赋”,只要他随风起舞,与风向保持一致就够了。